

幸運號碼 100

程美寶

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

《通訊》從剪刀、漿糊、手工貼、影印的方式出版到電腦排版的正規印刷，歷經廿多個寒暑，跨越千禧年代。千禧年前後曾擔心的電腦千禧蟲問題似乎沒有留下什麼惡果，沒想到當下全球許多學人都要在新冠病毒的陰霾下與 zoom 共處，而《通訊》也在這個時候醞釀宣佈停刊了。也許是出於一種無意識的數字迷信，它出刊到第 100 期為止，不是九十九，也不是一零一。不虧缺，不漫溢，很圓滿。

也許好歹經歷過剪刀、漿糊、貼手抄、影印的時代，我尤其懷念早期《通訊》粗糙的風格，它讓我聯想到上世紀 20 年代鉛印的《民俗》周刊。這種聯想不免有點暗自驕矜，《民俗》是破繭而出的、劃時代的，它後來因為意識形態和人事之爭而被迫停刊，那場鬥爭是具有學術意義的；《通訊》是 20 世紀末過渡期的產物，從它被貼上一個 ISSN 開始，便注定最終要在學術「規範化」的洪流退場。新時代的學術和排版風格，不容許它在這裡刊一篇〈寫在前面/後面的話〉，在那裡載一段夾雜許多主觀感受的札記，更少有與上一期某篇文章商榷，版面設計也不會再在中間某處畫一條花邊或左下方加一個框框。它的文章逐漸變得循規蹈矩，注釋滿滿，靠近學刊論文，好用來劃等算分。《民俗》時代的「清水」君那種對家鄉滿懷情緒的文章，到了《通訊》時代肯定是要被我們退稿的。

比《通訊》更早退出歷史舞台的是「華南研究年會」，由於它最後幾年沒有再冠以「第幾屆」的名義，它沒有如《通訊》一樣以一個「幸運號碼」結束，而是逐漸無疾而終。之所以說是「逐漸」，是停辦初期總會有人問：「今年還會辦華南會嗎？」，後來便沒有人問了。不再問，就等於說某事真的畫上句號了。「華南研究會」無疾而終，結束的不止是一個會議，也是某種風格和風氣。它

沒有年度主題，永恆的主題就是「華南」（和華南以外）；它沒有近年流行的主題演講，但凡是韋慶遠、蔡鴻生和楊寶霖等老師發言，就是主題演講，與會者都會洗耳恭聽；它也有議程，但議程是在開會前一夜的最後一刻才拼湊出來，因而經常引起凡事認真的主事者不滿；它沒有什麼經費，也不收註冊費，但好歹能吃一頓簡簡單單的飯。後來終於有經費足夠讓大夥兒乘車到鄰近的鄉鎮走半天，走在鄉間的小路上，在大樹底下暫歇停留，學問人情就是在笑談間交換的。

讀歷史的我們都十分明白，這樣的文章再寫下去便是白頭宮女話當年，幸好我們都很能自我安慰，撩撩幾筆（敲敲鍵盤）便說自己在留個歷史記錄。也可幸的是我們能選用天干地支紀年，不受西元進化之困，就說《通訊》是在辛丑年結束的，周而復始，死而後生。

謹以此短文應黃永豪兄約稿，感謝他多年的堅持，讓《通訊》能出版百期，儘管我知道低調的他可能會行使編輯的特權，將這最後一段刪去。我在此保留作者的權利，與編輯爭持到底，因為再沒有第 101 期可以致函投訴了。😊

辛丑年人日草就